

河南永城西汉梁王陵墓出土葬玉蠡探

武 玮

(河南博物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Abstract Presently, the most abundant jades including jade burial suit, jade corks, jade coffin decorations and jade *bi* etc. have been unearthed in the tombs of the king and queen of Liang State at Yongcheng in Henan Province. The materials of the jade burial suit of early Han Dynasty i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ose of late Han Dynasty, and the jade *bi* is often buried with the dead, but the jade corks of nine apertures is not complet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burial jade is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of Liang Stat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ideas of grading and life - and - death.

Key words the king of Liang State; burial jade; grade; the idea of life - and - death

摘要: 目前河南永城西汉梁王、后陵出土葬玉品种丰富, 包括金缕玉衣片、玉塞、玉棺饰、玉璧等。早期玉衣材料明显优于晚期玉衣, 并使用玉璧敛葬, 但出土的玉九窍塞并不完备。其葬玉的发达与梁国经济繁荣、汉代王权等级观念加强及生死观念等有关。

关键词: 梁王; 葬玉; 等级; 生死观

河南商丘永城芒砀山为西汉梁国王陵所在地。史料记载自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少子刘武始封于梁国, 至王莽篡权国除(9年), 历经9代王, 延续长达170多年发展历史。目前已经确定西汉梁王陵墓主要分布在芒砀群山的保安山、李山头、夫子山、铁角山、南山、黄土山、僖山、窑山等8座山头上。但这些陵墓多已被盗掘, 出土玉器较为零散^①。梁国玉器按用途可分为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三类,

其中专用于死葬和保存尸体的玉器出土数量较多, 种类较全, 为我们研究西汉诸侯王丧葬用玉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梁王、后墓葬出土的丧葬用玉占出土玉器的绝大多数, 种类主要有玉衣、玉九窍塞、玉握、玉琀、玉璧、玉棺饰等。(见表)其出土葬玉有以下几点特征:

表: 河南永城梁王、后(妃)陵墓出土葬玉

| 时 代 | 出土墓葬与时间 | 出土玉器 | 出 处 |
|-------|-----------------|-----------------------------------|--|
| 西汉中期 | 1992年永城梁王保安山二号墓 | 玉璧 3、玉圭形饰 1、三角形饰 1、玉衣片 2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年。 |
| 西汉中期 | 1971年永城梁王保安山三号墓 | 玉衣片 58、玉鼻塞 2、玉琀 1、玉璧 5、玉板 80、玉蝉 1 | 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永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 第 77~ 79 页, 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
| 西汉早中期 | 1990年永城柿园汉墓 | 玉片 2 | 《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 第 231 页。 |
| 西汉中期 | 永城梁王黄土山二号墓 | 玉蝉 4 等 | 《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 第 307 页。 |
| 西汉晚期 | 1998年永城梁王窑山一号墓 | 玉衣片 300、玉璧 9、玉环 1 | 《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 第 249~ 255 页。 |

| 时代 | 出土墓葬与时间 | 出土玉器 | 出 处 |
|------|---------------------|------------------------------|--|
| 西汉晚期 | 1989、1993年永城梁王窑山二号墓 | 玉衣片 55 玉璧 37 玉板 1 玉握 1 | 《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 268~270页。 |
| 西汉晚期 | 1995年永城梁王僖山二号墓 | 玉衣片、玉璧、玉猪等 | 《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 289页。 |
| 西汉晚期 | 永城梁王僖山一号墓 | 玉衣片 1000余、玉璧 70余、玉猪、玉耳塞、玉鼻塞等 | 商博:《永城芒山发现汉代梁国王室墓葬》,《中国文物报》1986年 10月 31日 1版。 |

一是梁王、后陵墓出土的玉衣均用金缕编缀而成,且早期玉衣材质明显优于后期。

玉衣又称“玉柙”、“玉匣”,是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的敛服,外观和人体形状相同。据《西京杂记》卷一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玉衣的出现应与春秋战国时期死者脸部覆盖的“缀玉面罩”和身上穿着的“缀玉衣服”有着渊源关系。玉衣的形制和编缀方法,显然受到当时铁质甲胄的影响。如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玉衣片形状多作凸字形鳞甲状,其排列与编缀方式模仿西汉初期出现的鱼鳞甲。形制完备的玉衣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②。根据目前发表的考古资料,西汉时期的玉衣又分金缕、银缕、铜缕、丝缕几种。梁王墓地的玉衣片几乎发现于所有的梁王和王后陵墓中。如僖山一号汉墓出土 1000余枚玉衣片,窑山一号汉墓出土 300枚玉衣片,僖山二号汉墓出土 253枚等。部分玉衣片穿孔内残留有金丝,说明梁王和王后下葬时所穿的玉敛服均为金缕玉衣。玉片颜色可分为碧青色、青灰色、青白色、灰绿色、灰白色、白色和黑灰色等。玉衣由头罩、面罩、上衣、手、裤筒、鞋套等不同部位组成。不同部位的玉衣片形状大小各不相同。

梁王陵墓出土的早期玉衣质量明显优于后期。如保安山三号汉墓为西汉早中期的竖穴土坑墓,墓室规模比梁王和王后陵要小,发掘者推测该墓有可能是梁孝王妃嫔墓,埋葬年代大致在西汉武帝前后^③。墓中出土 588枚金缕玉衣片,皆碧玉质,用料精良,较僖山一号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更加精致。其中长方形玉衣片 501枚,三角形玉衣片 17枚,圆形玉衣片 1枚,正方形玉衣片 1枚,长条梯形玉衣片 59枚,不规则四边形玉衣片 7枚,分属于玉衣的不同部位。玉鼻罩 1件,由整块玉切割、掏挖制成鼻形,断面呈拱桥形,两侧边沿处钻有小孔。鼻孔处再用一片半圆形玉片串接。环形玉片 1件,残,形似玉璜,

两面抛光,表面透雕卷云纹和阴线云纹,近外沿一周根据需要不均匀地分布着小孔,以穿金缕,用于玉衣头罩顶部中心。玉衣按金缕、银缕、铜缕分级的等级制度应始于东汉时期。《后汉书·礼仪志》记载金缕玉柙为天子葬制。而西汉时期这种玉衣等级制度尚未确立,除皇帝外,诸侯王及某些列侯也可以使用金缕玉衣。梁孝王刘武为文帝少子,景帝同胞弟,为其母窦太后宠爱,又平定七国之乱立下大功,深受皇帝恩宠。《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刘武在位时“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发掘者推测其妃嫔死后有可能仿效帝王制度使用金缕玉衣。现已探明永城芒砀山葬于西汉中期前的王、后及妃嫔墓有四座:保安山一号墓为梁孝王墓,但随葬品早已盗掘一空;保安山二号墓推测为梁孝王后墓,也盗掘严重,仅剩白玉质玉衣片 2枚及玉璧、玉玦、玉饰片等;柿园汉墓推测为某代梁王、后或梁孝王妃嫔墓,入葬年代大约在西汉景帝至武帝早期。墓内也仅剩有玉片 2枚,青灰玉质。因此保安山三号汉墓玉衣可以说是西汉梁国早期玉衣的代表。后期梁国玉衣制作则明显不如早期,同一套玉衣多使用不同材质的玉料,如窑山一号墓出土的玉衣片有黑灰、灰白两色;窑山二号墓出土的玉衣片分青和白两色,玉衣片多数两面磨光,少数仅正面磨光,背面保留有切割痕迹。多为素面,仅有少数玉片可能用旧玉残片改制而成,上面还保留原有的弦纹、涡纹和蒲纹等纹饰。这一期以僖山一号汉墓出土玉衣为代表。僖山一号汉墓为西汉晚期墓葬,出土的玉衣片有 1000多枚,皆青玉质,复原后全套玉衣共用玉片 2008片,玉片之间都用金丝加以编缀。头部由脸盖和头罩构成,脸上刻制出鼻子的轮廓;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组成;左右裤筒按人体下肢的形状制作;手作握拳状;鞋为方头,平底,高腰。其玉衣形制与河北满城中山王夫妇墓^④、广州南越王墓^⑤所出土玉衣大体

相近。

二是伴随玉衣出土有玉九窍塞、玉琰、玉握等，但尚未发现完备的玉九窍塞同出。

玉九窍塞、玉琰、玉握等也为梁国墓葬中常见丧葬玉器。玉塞是汉代独有的葬玉，组合最全的是九窍塞，用以填塞或遮盖死者身体上九窍之孔，防止精气逸出体外。《抱朴子·对俗》言：“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九窍塞是包括眼盖、鼻塞和耳塞各 2 件，口塞、肛门塞、阴茎罩（或阴门塞）各 1 件。完备的九窍塞都出于玉衣墓中，如河北满城中山王墓。徐州九里山刘和墓出土的玉塞有 7 件^⑥。其余大部分诸侯王墓玉塞只有两三件，比如口塞、耳塞、鼻塞等。永城梁王、后墓中尚未见有完备的九窍塞出土。如保安山三号汉墓出土鼻塞 2 件，碧玉质，状如蘑菇。僖山一号墓只见到鼻塞和耳塞两种，白玉质，形制皆为圆柱形。

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看，早在新石器时期六七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就已经出现玉琰、玉握^⑦。西汉时期的玉琰大多为蝉形。蝉体扁平，双目、吻部及双翅尖、尾尖均突出体外，以直线或弧线勾勒出首、双翼、腹、尾等细部，纹饰刀法简练有力，雕工技艺娴熟，俗称“汉八刀”。保安山三号汉墓出土碧玉琰，玉质温润晶莹，通体琢出蝉形，用阴线表现蝉的双眼、双翅和尖尾，形态生动逼真。西汉时期的手握玉有几种不同的形制，如玉璜、玉佩、玉猪、玉觿等。但在西汉中期以后，流行以玉猪为手握。僖山一号汉墓所出玉猪，以褐色玉制作，呈卧伏状，以简练的刀法雕出猪的嘴、耳和四肢，线条简洁生动^⑧。而窑山二号汉墓出土青白玉握为长条板形，两端稍尖，形制简单。

三是陵墓出土玉板饰，推测梁王、后死后使用嵌玉漆木棺敛葬。

保安山三号汉墓、保安山二号墓、窑山二号汉墓中出土有不少玉板。如保安山三号汉墓共出土玉板 80 枚，青白玉质，形状有三角形、菱形、圆形、梯形、长方形、不规则四边形、多边形等，多正面磨光，用阴线刻卷云纹，并根据玉板的形状在接近外缘处阴刻弦纹。也有的玉板素面无纹饰，还有些是用带有几何纹饰的旧玉器残片改制而成。此外窑山二号汉墓中出有玉板 1 枚，保安山二号墓也出有玉圭形饰、三角形饰、长条形饰。这些玉板、玉片也见于两汉其他诸侯王墓

葬中，多是为木棺镶嵌之物。如河北满城汉墓窦绾墓主室出有玉板，大多数为青色，少量为白色和灰色。形制以长方形为主，少数为正方形或梯形。玉板正面琢磨平整光滑，背面仅粗略加工。另有一些玉璧有规律地压在玉板片上。后经复原的长方形漆棺，内壁由 192 枚玉板镶嵌而成；外壁共镶嵌玉璧 26 枚和圭形玉饰 8 件^⑨。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也出有镶玉木棺一具，长 280 厘米，宽 110 厘米，高 108 厘米。木棺表面髹漆绘有图案，并贴有玉片、玉板等。玉片共 1809 枚，分长方形、菱形、三角形等；大玉板厚薄不均，分素面、带孔和带玉璧图案 3 种。镶嵌于木棺外表面，组成各种复杂的几何纹图案^⑩。永城梁王墓出土的玉板极有可能为镶嵌木棺所用。但由于玉板缺失较多，其镶嵌方式还不很清楚。

四是梁王墓中出土大量作为敛葬使用的玉璧。

早期的玉璧主要作为礼玉使用。战国中晚期时，玉璧开始作为葬玉使用。《周礼·春官·典瑞》载：“疏璧琮以敛尸。”郑玄注：“璧在背，琮在腹。”如山东曲阜鲁城发掘的战国中晚期大墓 M 52 墓主身上从头至足放置一层玉璧，身下垫一层玉璧，共用玉璧 18 枚；M 58 墓主身上身下也各置一层玉璧，共用玉璧 16 枚^⑪。这种在诸侯王胸、背铺垫玉璧以敛葬的制度在西汉时期被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完善。河北满城 1 号墓中山王刘胜玉衣内前胸和后背共置玉璧 18 枚，其中前胸部位置 13 枚，排成 3 列，当中竖排 3 枚玉璧，两旁各对称竖排 5 枚玉璧。后背置 5 枚。2 号墓窦绾的玉衣内前胸及后背共置玉璧 15 枚，其中前胸置 11 枚，排成 3 列，当中竖排 3 枚大玉璧，两旁各对称竖排 4 枚玉璧。后背 4 枚玉璧上下排成 1 列。玉璧两面留有织物粘帖痕迹。推测先用丝带将玉璧彼此编接起来，后又在玉璧表面粘帖一层织物，把前胸与后背的玉璧各自编联一起^⑫。南越王玉衣内尸身上铺盖 14 枚玉璧，其中 2 枚置于头部两耳间，余 12 枚分成 3 列竖排。玉衣下即内棺底铺有玉璧 5 枚^⑬。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昌邑王尸身下放玉璧 10 枚，玉环 1 枚，尸体上置玉璧 17 枚^⑭。僖山一号汉墓梁王玉衣上、下均放置有多枚玉璧，玉璧多数残，直径大小不等。玉色以青色、白色、墨色为主，两面抛光，正反两面纹饰相同。少数璧面纹饰不分内外区，除边缘阴刻一周弦纹外，肉部通体浮雕

涡纹或蒲纹。多数壁面外缘阴刻弦纹一周，中间刻两周弦纹，或两周弦纹之间填以栉齿纹，将壁面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外区阴刻变形夔龙纹或凤鸟纹，内区浅浮雕涡纹或蒲纹。推测这些玉璧与满城汉墓、象岗山南越王墓、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的玉璧作用相同。

两汉时期是丧葬用玉发展的高峰时期。两汉诸侯王墓出土了大量的丧葬用玉，并出现了完整的葬玉组合，即玉面罩、玉衣、玉枕、玉九窍塞、玉珞和玉握等配套使用。西汉诸侯王墓出土的丧葬用玉除前面梁王墓提到的几类外，还包括玉枕、玉面罩等葬玉。玉枕一般配套玉衣同出。出有玉枕的西汉时期诸侯王墓有江苏徐州子房山M3^⑤、河北满城汉墓M1、M2、山东长清双乳山汉墓^⑥等。但并不是所有西汉诸侯王墓中皆出有玉枕。如满城汉墓玉枕内放有香料，而南越王墓则采用丝囊珍珠枕。这可能与各地葬俗差异有关。永城诸梁王墓葬由于盗掘严重，无法探知埋葬时是否亦使用玉枕。

二

文献记载梁王陵墓随葬器物丰富。如《艺文类聚》卷八三引《曹操别传》说：“（曹）操引兵入殒，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数万斤。天子闻之哀泣。”东汉末曹操派军队盗掘梁孝王陵墓，掠取金宝达到数万斤，可知随葬品数量之丰盈。其他梁王及王后墓也均遭盗掘，但劫余品仍较丰富。西汉梁国葬玉的高度发展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文景之治，武帝初年国力强盛。《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梁孝王时梁国疆域辽阔，且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为西汉前期的重要诸侯大国。《汉书·文三王传》记载：梁孝王时“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梁孝王死后，梁国一分为五，疆域已大为削弱，然较同期其他诸侯国相比，仍不失为大国。汉武帝元朔中，因梁平王不孝罪，“削梁王五县，夺太后汤沐邑”。这时梁国尚余十城。梁国在西汉时经济繁荣，国民富足，人口密集，其所辖陶、

睢阳为西汉重要的经济城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夫自鸿沟以东，芒、碭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加之梁孝王为窦太后少子，又拒七国之乱有功，得到天子丰厚的赏赐，“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故《史记·梁孝王世家》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于天子。”国家经济繁荣，人民的富足而奢侈之风甚盛。在儒家“孝”的提倡和“事死如事生”厚葬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普遍重视丧葬礼仪和随葬品的数量。故两汉时期墓葬出土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十分丰富。除显示死者的身份地位和富有外，亦寄托着生者对逝者的敬重和哀思。

二是武帝时对匈奴的多次作战胜利，清除了通往西域商路的障碍。张骞出使西域，又促进了汉廷与西域各国商业贸易的发展。文献中多处提到于阗国产玉石的记载。《汉书·西域传》载：“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原出焉。多玉石。”西域商路的开通使和阗玉料大量输入中原，解决了玉料来源问题。西汉诸侯王敛葬使用的玉料数目非常大，仅以玉衣为例，僖山一号汉墓梁王玉衣共用玉片2008枚；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玉衣共用玉片2498片，西汉南越王玉衣共用玉片2291枚，再加之其他丧葬用玉，这就需要充足的玉料供应其使用。而和阗玉石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为汉玉器敛葬的兴盛提供了物质保障。梁王墓出土的玉衣片经卢兆荫先生鉴定主要为来自新疆和阗的玉料。除了丧葬用玉外，其他日用装饰品和陈设艺术品如玉舞人、玉刚卯、玉带钩、玉簪、玉璜、玉具剑饰、玉杯等，也大都选用了优等新疆和阗玉制成，反映了汉代使用新疆和阗玉的广泛性。

三是西汉前期文帝、景帝虽对同姓诸侯国有所限制，但一些诸侯在财政、官员任命方面尚有很大的自主权。而这时期诸侯王丧葬用玉等级制度可能尚未建立起来。各地诸侯王使用的玉衣编缀形制不尽相同，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诸侯有能力使用本地的制玉匠师为其制作丧葬用玉，并重视玉料的选择。如西汉早期徐州狮子山和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包括玉衣在内的大量精美玉器，具有显著的地方风格。发掘者认为这批玉器主要是楚王室制玉作坊内制作^⑦。而且在丧葬制度尚

未完善的情况下，诸侯王的随葬器物有可能是僭越天子规格而制。梁孝王生前倚仗皇帝与太后恩宠，其出行仪仗尚比拟天子之制，其死后更可能是参照天子而葬，随葬器物规格也极有可能是比拟天子而设。关于梁国是否亦有专门为王室制作葬玉的作坊，现在尚没有文献和考古资料证实。然梁国前期经济繁荣，疆域广阔，故在武帝初期之前亦有可能其王、后及妃使用的葬玉主要为梁国自己的制玉作坊制作，当然也不排除为汉朝廷直接赐予。武帝亲政（前135年）之后，继续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削弱地方诸侯势力，此时各地诸侯已经无法与中央抗衡，《汉书·诸侯王表》称“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特别是武帝接受儒生们的建议，定礼仪，明制度，强化等级秩序，对诸侯使用的丧葬用玉也一定有进一步的严格规定。这一时期各诸侯王玉衣可能主要为汉朝廷东园匠制造并赐予，甚至在玉衣用料方面可能也作了一定的等级规定。在这一背景下，各诸侯王已不敢有任何超越礼制之举。故学者指出，至西汉中期汉玉的风格才真正形成^①。这也是造成葬于武帝时期的保安山三号墓葬形制虽为土坑竖穴式，墓葬规格较低，但墓主玉衣使用的玉料优于后期梁王使用玉料的主要原因。

四是西汉生死观念影响丧葬习俗。汉人重生，故生前崇信神仙及各种长寿仙方，希冀能够延续生命，成仙而摆脱死亡痛苦。但同时他们也看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在对待死亡上，认为死亡仅是此世生命的终点，生命甚至在死后的另一个世界中继续延续，故而希望能够完整地保存好躯体，最终在另一个世界生活。汉人将死后的世界逐渐与现实世界等同起来，除了将生前喜好和使用的物品带到墓中外，甚至将生前所追求的生命不朽、羽化升仙的思想也注入到墓室的营建中。如墓室中绘有的升仙壁画、刻有升仙内容的画像石以及置有与成仙有关的器物。而儒家和黄老之学对玉的人格化和神灵化也使玉石成为丧葬使用的主要材料。儒家“贵玉”，董仲舒《春秋繁露·执贄》有“玉有似君子”、“君子比之玉”之论；刘向《说苑·杂言》有“玉有六美，君子贵之”之赞；许慎《说文解字》亦有“玉，石之美有五德”之喻。儒家将玉的品性人格化、道德化，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说，并对玉器的佩戴和使用进行严格的规定，玉石为人们

广泛喜爱而倍加推崇。因此除了生前使用的玉器会随着死者埋入墓葬外，具有诸多美德的玉石更容易被人们选择作为死后随葬和保存躯体所用。此外，早在史前时期玉就被认为是灵性之物，为巫与神沟通的媒介^②。汉代道家进一步发展了玉的神性，认为玉可以帮助人们抵御邪恶、消灾避祸；服食玉可以“寿比如玉”，常服能“令人身飞轻举”，最终达到成仙之目的。故人们认为以玉敛尸则可以使躯体不朽，并通过不朽而达到生命延续并最终羽化升仙。如玉珮刻画为蝉形，是将蝉习性高洁、幼虫蜕化成蝉的特点寓意对死者羽化成仙的良好祝愿；而玉衣头顶置有玉璧形的玉片则是希冀死者的灵魂由地下通过壁孔得以升天^③。玉九窍塞的使用是为防止体内精气外泄，使躯体得以完好的保存。

总之，西汉丧葬用玉是承续先秦时期葬玉的基础上，加以扩大并种类逐渐齐全，组合固定。以玉衣为主的葬玉制度在汉代象征着身份和等级，是特权的标志。梁王墓葬虽遭盗掘，但出土丧葬玉器种类齐全，做工精美，为探寻西汉诸侯王丧葬礼仪提供了实证。当然我们对永城梁王陵墓出土葬玉的认识是初步的，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这都有赖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 ① 商博：《永城芒山发现汉代梁国王室墓葬》，《中国文物报》1986年10月31日1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第20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永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芒碭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河南商丘地区文物工作队：《河南永城黄土山三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永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商丘地区文化局、永城县文化馆：《河南永城前窑汉代石室墓》，《中原文物》1990年第1期等。
- ② 卢兆荫：《试论两汉的玉衣》，《考古》1981年第1期；卢兆荫：《再论两汉玉衣》，《文物》1989年第10期。
- ③ 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永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芒碭山西汉梁王墓地》，第80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下转第102页）。

完全实行素食是在梁武帝提倡素食之后的事了。

2. 出现奉鱼供养天当是地域文化和民俗的反映。在中国文化中, 鱼是吉祥的象征。《尔雅·释地》“鱼丽, 言太平, 年丰, 物多也。”把鱼当作供品用作祭祀是汉民俗一大传统, 并且这种风俗也被西晋皇家作为重要礼仪而使用。《晋书·志第九·礼上》载: “景初元年, 营洛阳南委粟山以为圆丘, 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 房俎生鱼, 陶樽玄酒, 非搢绅为之纲纪, 其孰能兴于此者哉!”说明在这一时期, 鱼用作祭祀之礼仍是一件崇高礼仪。北魏代晋而立, 实行全面汉化政策, 保留了这一重要祭祀之礼, 《北史》也详细记载了北魏皇帝“祀圆丘”祭祀活动, 可以断定, 祭品之中肯定包括鱼。万佛山石窟开凿于北魏宣武、孝明年间, 时风所至, 世俗化倾向十分浓重, 将当时社会风俗反映在石窟寺里也在情理之中, 奉鱼供养天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3. 时至今日, 寺院在佛教素食中仍有鱼形素食, 从一个侧面说明, 鱼供奉应当是存在的。

综上所述, 奉鱼供养天的出现, 表现了北朝

佛教汉化发展的脉络, 表现了汉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对外来宗教的改造, 是按照汉民族审美意识和审美倾向对龙王、神王形象进行重塑的产物, 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开放性与创造性。这一浮雕对研究中原佛教神演变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 ①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 第 232~234页, 文物出版社, 1994年。
- ② 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 第 143~144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 ③ 《中国石窟雕塑精华·河南巩县石窟》, 重庆出版社, 1997年。
- ④ 金申:《关于神王的探讨》, 《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 1期。
- ⑤ 赵秀荣:《北朝石窟中的神王像》, 《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 1期。
- ⑦ 陶思炎:《中国鱼文化》, 第 18页, 北京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0年。

(责任编辑: 武玮)

(上接第 95页)

社, 1980年。

- ⑤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 文物出版社, 1991年。
- ⑥ 龚良等:《徐州地区的汉代玉衣及相关问题》, 《东南文化》1996年第 1期。
-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 第 16~89页, 文物出版社, 1988年。
- ⑧ 卢兆荫主编:《中国玉器全集》4 图 187, 河北美术出版社, 1993年。
-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第 234~244页, 文物出版社, 1980年。
- ⑩ 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 《考古》1998年第 8期; 李春雷:《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镶玉漆棺的推理复原研究》, 《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 1期。
- ⑪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 第 128页、131页, 齐鲁书社, 1982年。
- 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第 37页、245页、246页,

文物出版社, 1980年。

- ⑬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 第 155页, 文物出版社, 1991年。
- ⑭ 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 《考古学报》1983年第 4期。
- ⑮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子房山西汉墓清理简报》, 《文物资料丛刊》第 4辑。
- ⑯ 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局、长清县文化局:《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 《考古》1997年第 3期。
- ⑰ 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 《考古》1998年第 8期。
- ⑱ 古方:《论西汉中期玉器风格的变化及其社会背景》, 《中原文物》2003年第 5期。
- ⑲ 杨伯达:《巫—玉—神泛论》, 《中原文物》2005年第 4期。
- ⑳ 罗波:《汉代玉衣与汉代升仙思想初探》, 《文物春秋》1994年第 3期。

(责任编辑: 张得水)